

編後語

還有不到一個月，便迎來回歸的二十個年頭，作為維繫香港繁榮穩定基石的「一國兩制」，取得的成效如何？最近，全國人大委員長在北京一個座談會上總結了經驗，字裏行間不難讀出中央的不滿；同樣，香港社會內部自九七以來發生的連串事件，也突現了因「一國兩制」而產生的憤懣與緊張。在「一國」與「兩制」的天秤上，孰重孰輕，頗值得檢視反思。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兩位作者側重點雖有不同，但都在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並為其把脈，可謂適其時矣。

呂大樂回溯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過程，從中看出一國兩制隱藏的內在缺陷。他指出，香港前途問題從一開始就沒想過追求圓滿的解決，而是設法保持現狀，這種想法窒礙了香港社會日後應對中央與外部世界變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上世紀設想的治港藍圖是由前兩代人為之後幾代人設計，完全未能預見代際之間出現分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的構想並未重視與中國大陸建立一種動態的發展性關係。內外交困，當前的窘局自是不可避免。鄭戈的文章指出，一國兩制體現的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漸進主義立場，但它也有其剛性原則，這就是「一國」，即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但香港回歸二十年來的事實表明，一國兩制朝離心方向發展，「一國」的向心軸承受着愈來愈重的壓力。他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經濟、政治、法律原因，並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如果運行失敗，其結果只能是一國一制，而不可能是兩制變兩國。香港能夠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取決於在中央的判斷下香港人中愛國者的比例有多大。

如果歷史有其延續性，一國兩制在實踐上所遭遇到的困頓便不能不從香港的歷史語境中求解，那麼如何認識織造香港這個地方的一層層錯綜複雜的人文社會肌理便成了題中應有之義。本期幾篇學術論文，為讀者再現香港史上幾個重要拐點。賀碧霄討論了1949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以前，港共高層與民主人士如何處理私營報刊的問題，重新審視建國初年中共與民主黨派人士的關係。發生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被視為香港發展的分水嶺，以往研究只着眼香港政府與左派在「文宣」和「武鬥」兩條戰線上的對壘，黃震宇另闢蹊徑，提出第三條戰線，即「經濟戰線」，才是整場抗爭的關鍵。羅永生追溯上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個被稱為「火紅年代」中的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的複雜意涵，及其對當時學生運動、青年運動，以及其後民主運動的影響。黎國威分析香港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獅子山下》及其主題曲，以及其他流行文化文本，闡明「獅子山」作為建構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資源，以至於演變為當下香港社會本土論述和國族論述符號的歷程。

圖像一如文字，都是記述歷史的載體。李世莊在「景觀」欄目介紹了香港攝影師黃勤帶的作品，讀者只需凝視粗粒子的黑白照片，彷彿就能穿越光影的縫隙，重回昔日的歷史現場。對許多人來說，那個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家。